

炎黄文化研究丛书(四)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

炎黄文化 与中华民族

黄爱平 王俊义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编
炎黄文化研究丛书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

黄爱平 王俊义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黄爱平, 王俊义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11

(炎黄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300-01689-8/K · 184

I. 炎…

II. ①黄…②王…

III. 文化史-研究-文集

IV.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646 号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组编

炎黄文化研究丛书

④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

黄爱平 王俊义 编

出版 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码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9 000

定价: 14.00 元

弘扬民族文化 贵在开拓创新

（代 序）

冯 征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本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进步，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多做贡献的宗旨，先后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瞩目和欢迎。现在，我们又以“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为主题进行学术讨论，无疑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这里，我仅就这次讨论会中涉及的几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第一，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炎黄二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骄傲。炎黄文化是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古代文明开端，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的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影响深远，汇聚和融合了中国各民族（包括汉族和满、蒙、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等56个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炎黄文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简称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共同创造、丰富了光辉灿烂的中华炎黄文化，中华炎黄文化又推动和促成了中国各民族的融合、统一和发展，炎黄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关系就是如此紧密关联，相辅相成不能分离。

这次会议中有人提出，炎黄二帝是华夏部族的首领，汉族的祖先怎么能说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呢？张岱年先生说得好：说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不是从血缘上来讲的，而是因为炎黄二帝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神农氏炎帝是农业专家，是我们祖先从游牧狩猎向农业过渡时期的英雄。黄帝是人文始祖。当时还没有文字，但炎黄二帝的奉献精神和他们所创造的伟大业绩，几千年来一直被我国各族人民传颂着。各族人民都以有这样的始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至于他们血缘上属于哪一个民族，他们的嫡系后代又是哪个部族、哪个家族，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也难以考证。我们所继承、弘扬的炎黄文化，也不是单纯哪一个部族、家族的文化，而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融合的、并且吸取了外来的优秀文化（如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的精华）逐渐形成的。其中，既包括人口众多的汉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各个地区性的文化。今天会议上，我们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回族知名人士黑伯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彝族研究所所长、彝族著名教授刘尧汉在发言中，都认为把炎黄二帝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的说法是正确的。说炎黄二帝是始祖，也只是说是我们始祖的代表，而不是说炎帝、黄帝两个人就繁衍了我们十一亿子孙。那么理解，就没有意义了，也不可能。他们呼吁要进一步促进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紧密团结，百倍地增强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他们还建议吸收更多的少数民族同志参加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研究工作。他们的发言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欢迎。我认为，这也可以作为我们“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获得的共识。

第二，炎黄文化孕育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又是一个

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在我们已经举行的几次座谈会和这次讨论会都作了探讨，大致认为应包括：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融合与自由的精神等。有的专家学者还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杀身成仁的爱国主义精神，舍身取义的集体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劳动致富精神等。这些都是中国各族人民战无不胜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中华炎黄文化的精萃和灵魂。

第三，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为了发展、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倡古为今用，贵在开拓创新。大家在发言中谈到，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一个深刻感受，就是评价我们的一切理论思想文化的作用，必须看它是否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当前就是要看能不能贯彻落实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华炎黄文化既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华炎黄文化的新发展。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研究中华炎黄文化，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能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中心来进行。对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两个文明建设的优秀文化，要大力提倡、宣扬；对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文化糟粕，要限制、批判，清除其影响。这里有必要指出，崇洋媚外思想和民族虚无主义是错误的，有害的。对传统文化照抄照搬，食古不化也是错误的。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封建落后文化和不断袭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中腐朽颓废的方面，必须认真批判和坚决抵制。

第四，中华炎黄文化既是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也深深地扎根和蕴藏在人民中。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一方面要发动专家学者

去做，定期不定期地举行研讨会、报告会，编辑出版书刊、专著等等，另方面要深入人民群众中去发现和挖掘，要结合群众的生产、经济活动，动员群众展开研究，直接为现实服务。前些时候我到苏南地区参观了江阴华西大队的农民公园和无锡县的吴文化宫。他们结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重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华西大队群众自建的农民公园中，有为农民所喜爱的显示讲信义的“桃园三结义”和重视知识分子和人才的“三顾茅庐”的雕塑，这对发展乡镇企业和广泛吸收延纳科技人员很有帮助。吴文化宫有稻谷馆、蚕桑馆、人才馆，系统地介绍了无锡地区吴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当地的革命先烈和革命传统，对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发展当地经济大有好处。好多地区还把举办重大文化艺术活动（如民间艺术节、风筝会、杂技节）直接和发展旅游事业，洽谈经济贸易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和研究如何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这是值得重视和提倡的。近年来，日本、东南亚各国和欧美，为发展经济和军事需要兴起的“三国热”、“孙子热”、“周易热”，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弘扬优秀民族文化，调动群众建设两个文明的积极性创造性，必将更加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我们应该为此作更大的努力，做出新的贡献。

目 录

弘扬民族文化贵在开拓创新(代序) 冯征 (1)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 李学勤 (1)

炎帝黄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 张岱年 (4)

炎黄时代与中华文明“基因”的形成 罗 琨 (6)

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特点 陈连升 (23)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几个问题 李绍连 (41)

中华民族思想是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 周桂钊 (68)

炎黄文化的民族学思考 田晓岫 (84)

从史学发展看炎黄文化的民族凝聚力 瞿林东 (94)

中国美术传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金维诺 (107)

满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王钟翰 (114)

明清时代满族地位的变化 孙文良 (127)

满族与中华文化 李治亭 (143)

13—19 世纪蒙古民族对中华科技文化的重大

贡献 伊力奇 (159)

维吾尔族的文化特色及其对中华文化的

贡献 朱玛洪·尼牙孜 (169)

维吾尔族文化漫论 特维库利·斯迪克 (188)

论藏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多 吉 (203)
论回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特色和影响	马启成 (217)
古代白族诸王国及其文化	马 曜 (235)
从彝族起源看炎黄文化	易谋远 (265)
中华彝族十月历和十八月历在世界文明史上 的地位	刘尧汉 (280)
壮侗语族诸民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 位和作用	刘美崧 (301)
编后记	(323)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

李学勤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告诉我们，在中华的辽阔疆土上，早在史前时代便有许许多多的民族部落生息居处，逐渐扩大融合，对国家和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全国各个地区和民族更是经常交往通会，开创出既有大量共同因素，又有各自不同特点的文化。因此，我们考察历史时必须注意到，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是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是古代很多民族的共同祖先，也是种种文明事物的创造者。早在两三千年以前的周代，已经流传着以炎黄二帝为祖先的谱系。古书中有关记载，尽管有些分散零碎，在细节上有不少出入，但是基本的轮廓是一致的，比较清楚的，这是因为这种谱系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从远古传流下来，得到当时人们公认的。

有些学者认为炎黄二帝的传说，特别是黄帝事迹，是到战国时才兴起的，这个看法并不正确。在现存文献里面，关于炎帝、黄帝的最早记载是《逸周书》的《尝麦篇》。这一篇的文字有好多特点，肯定是西周时的文献，而且可以和《尚书》中的《吕刑》联系起来。篇中记有国王的一段话，详细讲述了赤（炎）帝、黄帝杀蚩尤的事情。至于记述春秋史事的《左传》、《国语》，谈到炎帝、黄帝的地方就更多了，还有收在《大戴礼记》书里的《五帝德》、《帝系》两篇，是孔子弟子所传，《史记·五帝本纪》正是根据它

们编写的。

仔细研究这些史料，不难知道以下几点。

首先黄帝是先秦几个王朝的共同始祖，古书中常见，“三代”，指夏、商、周，有时前面再加上虞（包括唐尧，虞舜）称作四代。虞、夏的祖先是黄帝之子昌意，商、周的祖先是黄帝之子玄囂。这样的传说表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这几个王朝，虽然互相更代，仍有着血缘以及文化的联系。近年已有一些学者从考古学出发，对这种联系性进行很有意义的探讨。

黄帝据说有二十五子，其中十四子得姓（建立了部族），共有十二姓。《帝系》只提到玄囂、昌意二子，是由于其后裔建立王朝的缘故。容易推想，整个二十五子的分布，要比虞、夏、商、周王朝本身广泛得多。过去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做过一些探索，如清代秦嘉谟的《世本辑补》。看他们的研究，可以知道很多古代方国或民族都有是炎黄后裔的传说，有些是边远的民族。例如：北狄，传说是黄帝之孙始均的后裔，春秋时赤狄是姬姓，白狄是酉姓，都在黄帝之后十二姓以内。

熏粥，传说是夏的后裔，当然也就是黄帝的后代，据云夏桀死后，其子熏粥以桀的众妾为妻，逃到北方游牧，后被称为匈奴。这可能反映了夏人北迁的情况。

犬，传说是黄帝所生苗龙的后代。

氏人，传说是炎帝之孙灵契（音契）的后人。

蜀，也与黄帝有关，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乾荒，乾荒生颡顼。后来颡顼的庶子封蜀，在夏、商、周三代作诸侯。

苗民，传说也为颡顼之后。

商代在后来的齐地有逢国，其君伯陵是炎帝之孙。

越，传说是夏王少康庶子所封。

这一类传说，近世史学家多弃置不顾，以为是晚起的附会之谈。其实，在古代讲一个方国或者民族的始祖，是一件大得很的

事，断断不能信口雌黄。上面引述的这些古书中的说法，有的可能反映历史的实际，有的可能代表民族的融合，无论如何，都表明了炎黄二帝受到广泛宗奉的史实。

炎黄二帝系统以外的传说人物，当地也有流传，他们有的和炎黄系统有血缘关系，例如通婚，如上面提到的蜀山氏之类，有的尚待考定，但他们都在古代历史观察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连传说被黄帝所杀的蚩尤，后来也由于善战为人尊奉。《鹖冠子·世兵篇》甚至以黄帝百战与蚩尤七十二战相提并论。

如果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炎黄二帝的意义更为明显，古书有许多炎黄时期发明创造的记载，尤其是黄帝时期的创造，多出诸臣，如《世本·作篇》讲的，包括天文、历法、律吕、算数、乐器、图书、冕服、杵臼、弓矢、驾车、舟船等等，足见黄帝可称古代文明的象征。古代中国的各个民族，即使在血缘谱系上与炎黄传说无关，从文化来说，仍然在炎黄以来的大文化圈内，并且有所参与，有所贡献。炎黄二帝的传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长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样看来，今天世界上华人华裔自称炎黄子孙，是有道理的，我们说研究炎黄文化，就是要探讨和发扬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炎帝黄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

张岱年

20年代至30年代，疑古思潮兴起，怀疑上古传说，把尧、舜、禹的历史真实性都否定了，炎黄更不在话下了。现在，到了90年代，学术界大力宣扬炎黄伟绩，这可以说达到了否定之否定，这是对于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轻易否定上古传说的矫正。

首先要明确传说与神话的区别。疑古派把三皇五帝都看作神话，认为尧舜禹都是神话人物，认为尧舜禹本来都是天神，后来转化为人王，炎帝黄帝就更是天神的称号了。事实上，这种看法不过是想当然耳。传说与神话是有区别的。神话是有意编造的，传说则是远古以来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都是神话。而炎黄、尧舜禹的故事，则是传说。传说可能把历史人物过分夸大了。但仍然是人而不是神。

上古时代的传说所包含的内容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在历史上，畜牧时代先于农耕时代，农耕时代又先于文字服饰的创造。如《周易系辞》所说，包牺氏“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这是畜牧时代。“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这是农耕时代。“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这是创造衣服舟车的时代。《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后来的传说文字书契是黄帝时代创造的。包牺氏结绳而治，到黄帝时才有文字，这也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在上古传说的资料中，有的文献认为炎帝即是神农氏，有的文献认为炎帝不是神农氏。事实上，在传说中，炎帝并非止一人，神农氏亦非止一人。可能是有一个神农氏亦称炎帝。传说来源久远，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应当承认，上古时代是文明创造的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开创时代。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在文明创造的时期，有些伟大的人物对于文明的创造有过突出的贡献，这应当是可以理解的。就后代有历史记载的发明创造来说，如蔡伦造纸，毕昇创制活字印刷，这是人所共知的。也有人发现蔡伦以前已有类似纸的制造品，但是蔡伦对于造纸的贡献还是应该肯定的。至于毕昇创制活字，更是个人的创造了。古代传说将许多发明创造都归于炎黄二帝，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我认为炎黄二帝是中国上古时代最伟大的文明创造者，是中国古代文明创造的象征。

我们肯定古代传说的价值，乃是肯定远古以来口耳传说的历史价值。汉魏以后，也有许多伪造的古代传说，如汉代的“纬书”中的故事以及《列仙传》等书中的故事，都是后人伪造的，不能算作古代传说。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汉代初年所保存的百家关于黄帝的言论，内容驳杂，亦未必都是真正的传说。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千百年中存在着关于黄帝的传说，还是应该承认的。

炎黄时代与中华文明 “基因”的形成

罗 琨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也有不少多民族的国家，但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却以自己独有的特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创造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①，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建设未来，不能不了解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遗传“基因”的形成。

关于中华文明的特点，老一辈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多次论述过：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我国虽是较晚的一个，但是从历史悠久而连绵不断，文化发达而丰富多彩，两千年前已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过去曾对人类作出过伟大贡献，在当代国际事务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等方面来说，是几个文明古国中仅见的^②。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这种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自奠基之时就是在不断探索与创造中前进，在不断融汇新鲜血液的过程中成长，从而保证了它的活力常新，更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诞生埋下了种子。细究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凝聚力的遗传“基因”，正孕育和最初形成于炎黄时代。

炎黄时代是指以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所代表的历史时代。传说中的神农氏是原始农业的发明者；黄帝则是文明初曙的英雄时代的象征。所以炎黄时代正是民族制度经历发展、繁荣，达到全盛时期又走向衰亡的全过程。在以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为

中心的广大地区，也是考古学上的整个新石器时代（包括了向青铜时代过渡的金石并用时期），时间跨度为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多年前，夏王朝建立了。如果按照传统观点，以夏王朝建立作为正式开启文明时代大幕的标志，那么炎黄时代就是踏上通向文明之路的整个历史过渡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代，纵观历史，在中华大地至迟于一百八十万年前已有直立人生息；此后历经一百五十多万年，进化为早期智人；再经过近20万年，完成体质的发展，于四万年前出现了新智人、产生了氏族制度，历经三万年的摸索，才发明了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而在此以后，仅用五千多年，就成功地进入了文明。所以炎黄时代是我们祖先第一个“大跃进”的时代。

这个跃进，有着坚实的基础，即生产经济的出现。人类怎样才能摆脱野蛮进入文明？在马克思的葬礼上，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③。在史前时代，文明的火花正产生于为解决吃喝住穿而实现的生存技术进步中。在攫取经济时代，旧石器文化成就的保证与限制作用影响了人们群体之间的交流，如发现于安徽巢湖地区的和县猿人生活在距今二三十万年前^④，与晚期的北京猿人同时，动物群性质与地理位置也有密切联系，但他们的体质特征却分属不同的亚种，说明北京猿人不曾追踪他们的猎物——中国大角鹿和斑鹿——向南分布，与和县猿人接触。研究者解释说，猿人阶段的文化成就保证了有比较稳定的洞居生活方式，而低水平的技术成就又限制了他们的活动半径，所以北京猿人与和县猿人都只在各自的地域内发展^⑤。而且当人类和其它动物同样靠攫取自然界现成产物为生时，也同

样被连锁在大自然的食物链上。为获得足够食物，人们只能结成原始分散的小集团，如澳大利亚的阿兰达人，最大的一个群体由40人组成，生活在250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塔斯马尼亚人的一个游群、通常只有10人—30人，最多不超过50人^⑥。这样，人类生存斗争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传授与交流都受到很大限制。

生产经济的出现，使人类得以获得空前发展。研究者认为，原始农业出现以后，人均土地需要量减少到1—5平方公里，再加上家畜饲养，土地需要量又可减少一半^⑦，因此社会人口与群体规模越来越快的增长起来。如仰韶文化的陕西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两处农业聚落遗址，属于同一时期的房子都有一百多座，居民人口估计300—400人以上^⑧。不仅如此，随着人口增多，一支支女儿氏族离开母氏族的发祥地，不断去开辟新的生存空间，以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密集地区已接近了近现代人口稠密区，在一些地方的密度几乎可以和现代村落相等。如陕西西安附近，每个现代村落差不多都建在古代遗址上；河南浚县大赭店一带的淇水沿岸，现在有15个村落，截止到60年代初，已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吉林松花江两岸、山东的日照和寿县一带，也有类似现象。就聚落规模而言，60年代河南洛宁韦寨村是当地最大的村落，它全部建在一个仰韶文化遗址上，相距不远的西王村老寨，仅占二十余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遗址西北角的一部分^⑨；在陕西渭水流域，仅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有95处，有的已形成120万平方米的大型村落^⑩。虽然这些聚落有些不是同时存在，而是先后建成使用的，但也可见距今六七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已日渐繁荣起来。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大，社会组织日益完善，人口密度的增长，为打破氏族狭小界限创造了条件。生产经济的产生、相对定居的实现，不断在衣食住行方面提出了新问题，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区域性文化，以后更随着社会